

# 后羿计划与嫦娥计划

## ——应对日本型文化侵华的策略构想

严加红 著

学苑出版社

# 后羿计划与嫦娥计划

## ——应对日本型文化侵华的策略构想

严加红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羿计划与嫦娥计划：应对日本型文化侵华的策略构想 / 严加红著。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077-5110-9

I . ①后… II . ①严… III . ①文化侵略—研究—日本  
IV . ①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2352 号

责任编辑：任彦霞

封面设计：陈四雄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址：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010-67601101（销售部）、67603091（总编室）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10mm×100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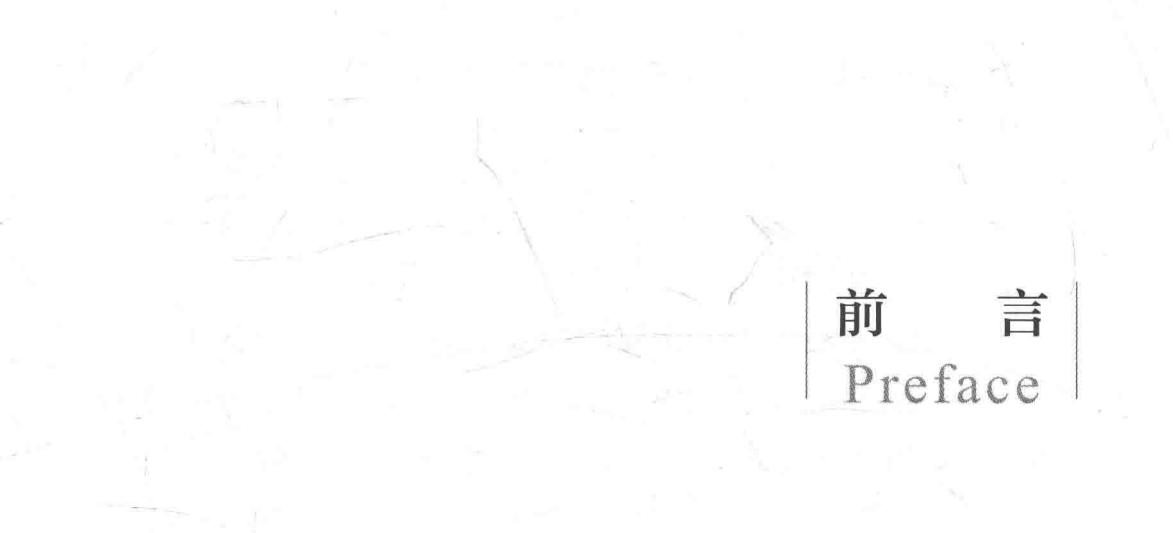
印 张：23.5

字 数：34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 前 言

Preface

日本列岛传统上隶属“大中华文化圈”的范畴，而中国大陆正是“大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域。但中日却在文化性向和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选择儒家体系作为“正统”思想，更倾向于选取社会伦理的视角；然而日本则选择中国传统经典《易经》作为传统文化范本，注重其中阴阳变易的思想，将自然物质世界的变幻作为视角，更加关注物质世界方面，而在精神和伦理方面坚持“日本主体”意识，明治维新以来更是强化本土化的特色。这样做的最终结局，就是在“大中华文化圈”中出现悖逆中华文化的诸多现象，并形成具有“去中国化”特色的日本型文化。由此看来，日本社会存在极为浓烈的反华制华的思想、意识、观点和行为，确实为日本型文化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即反华侵华是日本型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是需要认清和理解的重大问题，并需要寻到某种应对性的策略。这对中国乃至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虽然日本社会呈现出“虚实共生”的显著特征，但日本并非真正就是“魔幻”的国度，而是现实性的存在。虽然日本社会呈现出“泥潭”的突出印象，但日本也并非实质上就是浑浊不堪的“泥潭”，其社会自有运行的系统状态和发展规律。从系统角度来讲，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型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日本社会和教育中诸特征的存在。“日本型”文化的延续发展是现代日本社会的内在需求，毕竟日本存在特殊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氛围，而破解其文化和社

会的本质内涵与特征则是近邻中国所需要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日本型文化和社会中存在“反华邪性”和侵华本质，现实日本社会存在诸多反华制华的思想、意识、观点和行为，但此并不能抹杀日本在教育这种微观层面上所具有的些许光辉，虽然其中也同样存在诸多反华制华的成分。中国对待日本的态度，确实需要采取鲁迅先生所提出“拿来主义”的策略，要有鉴别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伪存真和取长补短。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日本虽然不是中国的“善邻”，然而却可认为是中国的“诤邻”，当然在特定历史阶段日本确实还是中国的“恶邻”，关键还是要看中国如何战略性和策略性地应对。

教育与文化存在极为紧密的“孪生”关系。日本教育的最大特色与优势就是建立起“学力社会”教育理念和“大教育”系统模式。前者密切日本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将教育的范畴由学校拓展到社会，并强调“学力”育成在教育发展和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导致日本教育观念、模式、方法和管理等方面改革与发展；后者拓展学校和社会“两大”教育系统，从而形成“大教育”系统模式，即在社会大系统中建构学校与社会“两大”教育系统并行的发展模式，并在此两者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的运行机制。社会教育系统的建立、发展与完善是日本教育系统建构与职能配置中的比较优势，毕竟由此日本建立起“大教育”系统模式。当然，日本还通过一系列规制性的措施，确保这种系统的有序、顺畅和高效运行，由此也就摒弃日本教育的传统观念与模式，建立起“学力社会”教育理念和“大教育”系统模式，从而超越传统社会和教育中的诸多观念樊篱与政策障碍，由此也就改善日本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日本教育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社会和政治现实而言，文化并非就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但对民族国家存在而言，文化却是最为重要的标志物。当然，文化也是民族和国家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与作用最为持久的有效工具。其实，日本文化就是这样的鲜明

实例。善于学习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特质，这与其岛国根性存在显著的差异，主要性向就是善于学习外部的物质世界，表现为注重学习某种自然观和化物成分。明治维新以来，借重西方科学技术就是日本注重学习外部化物的突出表现。但在日本文化和社会伦理中，则坚守“日本主体”意识，强化本土化特色，这也是日本善于学习的重要表现。日本文化强调主体意识和本土化特色，这对保持日本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性存在重大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但发展到“日本型”文化的阶段，日本却踏上另外的发展道路，即呈现出“膨大化”和“极端化”的发展倾向，出现军国主义思潮，这是“日本型”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至今仍在日本社会绵延不绝。当然，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还与西方法西斯主义存在合流的过程，并在东亚侵略与殖民中体现出极为强烈的反人类性特征，其实这正是日本过度强化民族和国家的主体意识和本土化特色所导致的必然结局。由此可知，日本“右翼”并不是“一小撮”，而是存在“日本型”文化的社会基础，即建立在神道教、天皇制度和武士道精神“三大支柱”的基础上，日本社会的“反华邪性”就是渊源于明治维新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日本型”文化特色，它在日本近代转型阶段出现，并构筑在悖逆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日本型”文化存在侵华本质，表现在日本社会就是充溢极为浓烈反华制华的意识、观点、思想与行为。当今日本所存在诸种反华制华的社会现象，其实就是“日本型”文化影响与作用于日本社会的现实反映。中国应采取联合东亚乃至世界诸国的做法，并采取诸种应对性的战略、政策与措施，用以杜绝日本东亚侵略和殖民的历史重演。

现行对日外交政策建立在中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这样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华是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所主导发动的东亚侵略和殖民战争，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有意识地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府和人民隔离开来，但这并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是历史认识上的虚构，其结果就是自取其辱。实际上来讲，目前日本政府和社会正采

取“以其道还治其身”的特别手段，比如表现在战后解决对华赔偿、道歉和反省等问题上，现实性地将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割裂开来。其实，中国政府应大胆和毅然决然地站出来，声言中国政府所放弃日本侵华战争的赔偿为国家赔偿，而并非是民事赔偿，中国受害者所要索取的是民事赔偿，并奉劝以人权和民权等西方精神为社会舆论标榜的日本社会，当然包括日本的政府和人民，不要再以中国政府放弃日本侵华战争的国家赔偿，或以追诉期已丧失等陈述为借口，肆意地践踏中国人民（受害者）的人权和民权，以及国际社会和日本社会的法治原则。当然还应及时地做出这样的提醒：若中国政府继续对日本采取宽容和怀柔的绥靖政策，必将会造成中华民族和文化，以及中国未来的灾难，更表现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大决策失误。

当然应该意识到，或许“愤青”一词是日本“网特”所故意散布的，其意在于对秉持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与精神的中国青年，进行策略性的人身攻击，让中国青年以被称“愤青”为羞耻事情。然而，具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与精神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是中国获取发展、崛起与强盛所不可缺少的“种子”，他们能在历史与现实中以“中国主体”的意识与精神，理性地看待中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关键问题：作为“愤青”，需要保持高度的理性，而不要成为“街头的混混”，甚至被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所利用，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此，应鼓励中国青年声明：我是“愤青”——理性的“愤青”，我自豪。其实在此方面，日本是中国的绝好榜样。钓鱼岛渔船事件发生特别是中方詹其雄船长获释之后，日本社会频繁出现“右翼”的言行，然而当问及日本“右翼”是否就是日本“愤青”时，当时身在中国的加藤嘉一评论道：“日本不存在所谓的‘愤青’。”看来这也是现实性的陈述，毕竟日本社会只存在“右翼”及其势力，具有一定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已作为社会组织，或不妨说以“准政党”“跨政党”或“超政党”存在，并不像中国的“愤青”，呈现散兵游勇的活动状态。况且，日本“右翼”还

存在“日本型”文化的坚实基础，以及社会组织、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撑。然而对中国的“愤青”而言，上述一切保障与条件都处在极度缺乏的境况之中，其实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认识与理解日本的文化、社会和教育，需采取战略性的态度，即要从战略层面上认清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反华本质，以及理解日本教育可供吸收与借鉴处，这正体现出客观分析的态度，而并非保持固定和僵化的探究心态，避免出现一味地针砭或盲目地崇拜日本等不良倾向与社会现象，在本质和现象层面上有差别地认识与理解日本文化、社会和教育中的诸种事情，从而更为深刻地认清中日之间所存在既相关又特殊的关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处理中日关系的新路径与新方式。观察和认识日本社会的诸种思想、行为和现象，需要进行必要的伦理换位，即不可单纯地依据中国社会的伦理，看待日本社会的诸多思想、行为和现象，因为中国视为大逆不道和有悖常理的事情，则可能会顺乎日本文化和社会的逻辑，这样的情形时常会发生。其实，日本“右翼”思想和行为就非常适应“日本型”文化的基本逻辑、本质规律和思维过程，但却与人间正道和正义，以及中国社会的伦理存在相违，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悖逆物”。由此看来，中日之间的冲突属于文化冲突的范畴，只是处于东亚文化冲突的范畴之内，甚至可以在“大中华文化圈”内部来加以认识与理解，即中日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并非就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文明冲突的行为逻辑。但日本文化和社会的诸种现象与作为，需要中国在战略和策略层面上做出谨慎的对待，并提出应对性的相关策略构想，从而有效地开创东亚社会和中日关系新的发展局面。

# 目 录

## Contents

<b>引言</b>	001
<b>卷一 绪论：日本型文化的侵华本质</b>	003
日本型文化侵华的时代赓续	003
日本型文化侵华的典型例证	005
日本型文化的初步分析	010
<b>卷二 应对构想（一）：后羿计划</b>	016
文化冲突与后羿计划	016
后羿计划的特征与内涵	018
后羿计划实施的基本步骤	022
<b>卷三 应对构想（二）：嫦娥计划</b>	028
日本型文化：嫦娥计划提出的文化根源	028
五大攻略：嫦娥计划的基本内涵	032
网络攻略：嫦娥计划内涵的时代发展	169

**卷四 公论：“两大”计划提出的社会基点 ..... 181**

国际格局中的日本因素：世界系统的分析视角 ..... 181

日本型文化的确立与变迁：历史文化的分析视角 ..... 194

战后日本反华制华的“泥潭”印象：思想行为的分析视角 ..... 221

**结束语 ..... 288**

**附录 ..... 292**

日本暗号现象及对中国的启示 .....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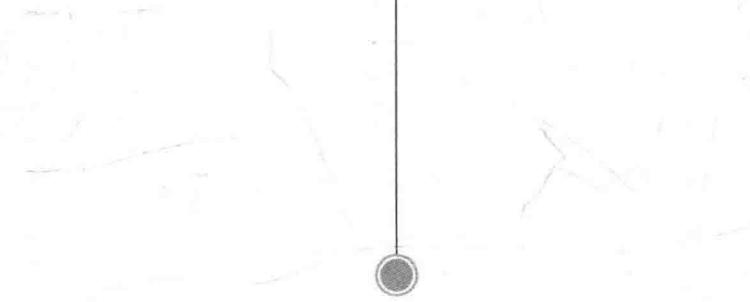
日本鼓励接收中国游学生政策的应对策略 ..... 301

日本“综力战体制”的理论来源与延续发展 ..... 311

若中日再战的战术预想 ..... 319

**参考文献 ..... 334**

**后记 ..... 361**



## 引言



日本型文化是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化类型的全新概括，具有三方面的显著特征，即本土化、“去中国化”和西方化，其中本土化为实质目标，“去中国化”为路径选择，西方化为现实道具。由此可知，日本型文化的核心特征就是确立实现本土化的发展目标，即不断地推进日本文化的本土化进程，“去中国化”和西方化则服从和服务于实现本土化的实质目标。但“去中国化”却是本土化和西方化的路径选择，虽然西方化只存在工具和手段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无论是本土化还是西方化，本质上又都是以“去中国化”为策略对象与路径目标。由此看来，日本型文化鲜明地具有侵华的本质特征。其实关键是要认清日本型文化的上述三大特征，即本土化、“去中国化”和西方化，以及这种类型文化的本质所在，从而获取认识和理解日本社会乃至教育的全新方法与途径。当然，日本社会还存在“虚实共生”规律和“泥潭生态”特征，并存在其内在的本质。上述核心概念的提出与阐述有助于深刻地认识与理解日本社会所存在极为浓烈的反华制华现象，反映出日本型文化所具有的侵华本质，并由此提出中国应对的策略构想：“后羿计划”和“嫦娥计划”，具体包含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等五大攻略，以及在现代信息社会日渐重要的网络攻略等内容。现代日本文化存在深刻的国际影响与社会作用，特别是在美国东亚“围堵中国”战略中，日本因素日益

成为中国必须慎重考虑的重要方面。因此无论是“后羿计划”还是“嫦娥计划”，都需要中国拿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无畏气魄，特别是要实现对日战略、政策和策略的时代性转变，确立在社会大系统中进行全局规划与系统发展的思维模式。



## 绪论：日本型文化的侵华本质

### 二 日本型文化侵华的时代赓续

日本型文化侵华可谓由来已久。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域实现了崛起，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强大帝国，而基础就是对东亚诸国，特别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侵略，其中就含有文化上的侵略。熟悉东亚历史的都会知晓，东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大中华文化圈”的范畴内涵，在地域上包括中华文化的孕育地——中国，以及中华文化辐射地——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甚至涵盖日本列岛。因此，日本对东亚文化上的侵略，在较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当然，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手法是多样的，比如战争劫掠、文物盗取和非法走私，其中战争劫掠是日本文化侵华的主要形式。由于日本是中华文化的辐射地，因此其对中华文化可谓“情有独钟”，可以说这是日本文化侵华的有利方面。毕竟这是日本相当熟悉的文化形态，甚至可以说这是其文化的“母体”。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的皇帝是“天子”的化身，日本的天皇则为“天孙”下凡，足见中日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紧密联系。

在走向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日本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劫掠，其程

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而且确实也表现为这样的情形。劫掠出现之后，大批中华文物“迁徙”日本列岛，成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文化收藏。当然，由于日本所占有诸多中华文物的来历颇不明确，因而在出示中华文物时就会存在难以言说的尴尬，这就导致诸多中华文物被永久性地封存在列岛的诸角落，短期内难以与大众谋面，这是文化上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和文化悲剧的延续。在战争年代，大批中华文物遭到劫掠，有的甚至现在还不知是否存世，比如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这对中华民族和文化而言是难以言说的隐痛。但还是应该坚信，诸多中华文物依然珍藏在某角落，并且可能就在列岛上。

在日本国家博物馆中，矗立着独立设置的中华文物珍藏馆舍，此即位于其正门右侧的东洋馆。其实中日两国在“东洋”概念上存在歧义：中国称日本为东洋，称西方为西洋；日本则称西方为西洋，这里不存在差异，而称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诸国家为东洋，这里确实存在地理常识性的错讹。毕竟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诸国家大多位于日本列岛的西面而非东面，可以称为东亚而非东洋，但日本就是这样称呼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诸国家，当然这是日本社会惯常的思维模式。在东洋馆中，除存在少量朝鲜半岛文物之外，90%以上都是中华文物，而且大多数在中国大陆诸多博物馆都难得一见的珍宝级文物，比如夏商时代石器和青铜器。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诸多中华文物在此难以标明出处，大多只是采取民间捐献形式进行标注，而这种标注的背后其实就是一段不一般的历史，这里存在近代以来日本的发展、东亚的变局，以及中国的衰落，特别是日本对东亚地域所进行侵略和殖民的历史。因此，中华文物的在日展示也正是日本文化侵华的历史证据。当然，其中也存在合法进入列岛的中华文物，包括通过交易等手段所获取的部分，但不能抹杀其中所存在大量在特殊时代非法进入列岛的中华文物。

确实，这里也存在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历史总是对现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照，这是历史思维模式在现实社会的反映。日本存在令人难以理解的诸多社会现象，其实也正是这种历史思维模式的反映，并不存在任何超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逻辑。外国人有时难以理解日本人的某些举动，中国网聊总会出现日本人变态的说法，其实这是对日本现实行为的误读。实质上来讲，日

本人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历史思维模式的现实性释读，并不存在日本人变态的情形。近代以来的发展史确实给日本人带来无尽的财富，并造就近代以来日本的强盛与辉煌，而且这种历史逻辑基本上已成为日本型文化和社会的思维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文化形态与社会状态。由此角度认识日本社会出现的诸种现象，就不会感到难以理解，相反对日本人的诸多作为会找到合乎历史逻辑的释读路径，其实上述就是认识和理解日本型文化重要的历史逻辑与思维模式。

## 二 日本型文化侵华的典型例证

由上述对日本型文化的理解与释读，反观在社会现实中日本型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基本上可以获取这样结论，即从文化角度来讲，日本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华文化产生长远的冲击，而且其影响与作用还具有现实性的特征，即已形成在和平时代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然而“反华邪性”是日本社会推进文化侵略的突出表现形式，也是日本对华战略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日本社会充斥极为浓烈的“反华邪性”，实质上含有文化侵华的意味，并以思想、观念、意识和行为等多种方式表达出来。比如在东京访学期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上课时，日本教师讲述“牛郎织女”的故事。故事缘起为中国人所周知，当然传播日本也是很久远的事情。但在日本教师看来，故事俨然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讲述故事时，只讲述故事的内容，并将此作为日本文化的内容传播给国际访学者，而不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其中的标签就是日本文化的内容。作为中国人，坐在这样的课堂上，倾听其讲述这样的内容，却全然没有提及隶属、关涉中国神话故事的标签，确实感到有点很不舒服。

但仔细想来，日本教师确实也讲述了忠贞爱情的真谛，而且故事已融入日本文化，因此也就理解了此种讲述的手法。从这样的事件中可以获取一些启示：日本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并是“大中华文化圈”的组成部

分。“大中华文化圈”的概念包括中华文化及其辐射地域之内的文化范畴。由上述角度来讲，若不存在恶意的歪曲，这种借用还可以理解。但从科学角度来讲，这种做法显然存在问题。毕竟在现实社会中，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被看成两种类型的文化，这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化分类，其中的关键就是日本文化已出现了特别的定型，存在更多有别于中华文化的具体内涵，比如相关研究学者归纳出日本“耻感文化”的类型特征。由这样角度出发做出判断，日本教师的这种做法存在严重的问题，毕竟中华文化的内容就应归属中国，而不能依然包括日本，这是在做文化研究时应注意的基本常识。由此看来，日本教师尚未完整地理解日本文化的内涵，犯有日本文化认识上内涵泛化的错误。但从另外角度来讲，这里不乏存在文化侵华的问题。毕竟在国际学生参与的课堂中，这种文化宣传的本身就具有文化侵略的含义。上述个案确实还只是不太典型的事例，只是反映出日本社会存在类似方面的事情，但还未能完全地表明现实日本社会存在文化侵华的本质特征。其实，日本型文化侵华存在诸多典型的例证：

其一，日本在选取诸多汉字名称时，存在某些与中国相关层面上的对应性暗示。主要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日本内部的地名。日本把与中国台湾地区相毗邻的小岛屿定名为“与那国岛”，而把获取美国转让管治权的琉球改名为冲绳县，无论是“与那国岛”还是冲绳县，其中汉字的含义存在令中国人回味的地方。毕竟，这些汉字名称大多出现在近代之后，即日本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出现急剧转折的悖逆时期。当然，还会存在更多这样需要特别分析与探究的汉字名称，特别是一些标志性的地名，比如御岳山和洞爷湖。二是日本对中国的称谓。近代之后，日本人为了报复历史上中国人称日本为“倭”，而改称中国为“支那”，虽然只是英文读音的译法，但其中明显含有浓厚的嘲弄意味，其实这是日本人对中国历史记载的现实回应。日本人认为，中国历史记载中称日本为“倭”，表达出对日本的蔑视态度，近代时期其终于有机会做出这样现实的回应。其实对现代中国人而言，值得进行历史性的深刻反省，毕竟虽然只是古代中国人以“中央之国”自居，但终于为近代日本人所报复，以致这样的影响还存留在现实日本社会之中。确实这是历

史性和现实性的悲哀，但其中也足见日本人的“岛国根性”。当然，从中还可以部分地窥视到日本社会所存在浓厚的“反华邪性”，及其存在内在和本质的情形。

其二，日本现实性地存在文化侵华的社会环境与氛围。若没有前往日本，当然难以深入地观察与分析其社会的诸多现象，也就难以理解与揭示其中的事实真相及相关论理。若旅居的时间过短，往往会为表面上的日本社会文明所蒙蔽；若旅居的时间较长，或产生崇日的心态，也难以探察日本社会的本质根性。因此，要深入分析与探究日本，就必须做到如下两点：一是时间要有足够长期，至少应在一年以上；二是要有足够细心与耐性，多在日本社会发现一些细节的问题。前者可以保证分析与探究的内容具有足够理性，能历史和辩证地看待日本社会所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后者足以做到以小见大，通过“解剖麻雀”的办法，更为深刻地认识与理解日本社会所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在上述方面存在诸多切身的感受：

一是在大学图书馆中发现的《满铁会报》。在“学艺”访学，闲暇时总爱到图书馆走走，当然也就习惯性地翻阅一些图书资料。在图书馆入门处，曾发现回忆性的资料集，采取杂志编辑的方式，主编为日本社会所存在有关“满铁”的社会组织。其实对此并不感到奇怪。日本社会组织发达，各种历史研究和“右翼”组织相当多，而且当前“右翼”组织喜欢拿历史说事，通常注重近代的事件，以及秉持“右翼”思想。《满铁会报》就是“右翼”思想的观点凝结，通过分析占据中国东北时期修建“满铁”的历史，反思其中的历史得失，当然集中表现为“右翼”特征。《满铁会报》记述“伪满洲”铁路 100 周年纪念会议，其中有原“满铁株式会社”总裁及相关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发言，并且还刊登以中国东北地方命名的各种组织，甚至包括一些学校名称。上述方面充分地表明，日本社会对日俄战争以来实际控制中国东北，仍心存旧念，并通过回忆和记述的方式，给予重新的梳理与反思。可以想见，一旦国际和日本的社会现实再次出现其所认为“成熟”的发展态势，日本社会的军国主义思潮还会卷土重来。其实资料的存在也从另外方面表明，日本社会存在极为强烈的文化侵华意图，即通过历史性的记述和回忆，